七日談（澳門篇）

克拉克瓷、定製與摹仿鏈

——澳門催生全球藝術對話

吳志良

十七世紀初，荷蘭東印度公司在馬六甲海峽截獲兩艘葡萄牙商船——「聖．迭戈號」與「卡塔麗娜號」。船上裝載着數以十萬計的明代青花瓷。這批瓷器被運往阿姆斯特丹公開拍賣，幾乎轟動了整個歐洲的上流社會。法王亨利四世、英王詹姆斯一世也爭相購買。從此，這類裝載於葡萄牙大帆船上的中國瓷器，有了一個世界通用的名字——克拉克瓷。

克拉克瓷的名字來自葡萄牙商船，但它的中轉地，卻在澳門。

十六世紀中葉，已有葡萄牙商人向中國定製瓷器的記載。一五五七年葡萄牙人獲准在澳門居留後，這種定製貿易日趨常態化。歐洲商號代理人與傳教士在澳門提出器形、紋飾與功能需求，經由華商網絡傳遞至景德鎮。景德鎮陶工迅速消化了這些異域元素，以青花技術為底色，創造了適應歐洲陳設與展示秩序的「分區開光」布局——盤心繪中國傳統的花鳥、松鹿、高士圖，寬闊的盤沿則被分割為八個或更多的扇形開光，交替繪製雜寶紋與西洋植物圖案。這種布局既保留了東方青花的筆墨韻味，又具備了西洋裝飾藝術的秩序感與對稱美。

克拉克瓷最初抵達歐洲時，這裏還沒有瓷器。歐洲人的陳設器與餐具以金屬器、木器和陶器為主。初見的青花瓷因其昂貴與稀有，基本只用作陳設，很少有人實際使用。然而，這種既美觀又耐用的器物很快改變了歐洲人的生活。陶器的缺點在於滲水率高，食物在短時間內容易變質，而瓷器不易滲水，能更好地儲存食物。中國瓷器不僅設計精美，胎薄耐用、便於清洗，用之飲茶不會串味，也不會造成銀器等茶具那樣的腐蝕。

從宮廷到民間，瓷器走過了從珍奇到日常的漫長旅程。

在歐洲，中國瓷器起初只有王室和各地貴族才有機會購買。薩克森選帝侯兼波蘭國王奧古斯都二世是「瓷器熱病」患者，擁有二十個房間的瓷器收藏，高峰期個人收藏總量多達五萬七千件。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一世早在達．伽馬遠航時就明確要求帶回兩樣東西：一是香料，二是瓷器。在法國，路易十四追逐風行歐洲的中國青花瓷潮流，在凡爾賽宮的花園中建起「瓷宮」；路易十五的衣帽間裏則陳設着乾隆年製景德鎮瓷瓶。

瑞典有位酷愛中國瓷器的貴族，派人拿着成套圖案萬里迢迢到中國定製，途中樣稿被海水浸濕滲出水痕，中國工匠忠實還原，竟將水痕也燒製在瓷器上——收到成品後貴族從不滿到驚嘆。十七世紀以後，景德鎮瓷器逐漸大量銷往歐洲，成為公侯伯爵生活的必需品，客廳裏、餐桌上皆以此擺設誇耀豪華富貴，皇家貴族出現了居家無一景瓷則不為風雅的潮流。

隨着貿易規模擴大，瓷器開始走向普通人家。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顯示，十七世紀經由該公司販運到歐洲的中國陶瓷累計達一千六百萬件；十八世紀大約每年有一百多萬件中國瓷器銷到荷蘭，而當時荷蘭人口只有約二百萬，連窮人家中都往往有一兩件中國瓷碗、瓷杯。在十八世紀的一百年間，從中國輸入歐洲的瓷器達到六千萬件以上。十七至十八世紀，中國瓷器如潮水般湧入歐洲，不但進入貴族的餐桌，最終也成為中下層階級的日用產品。

瓷器的普及深刻改變了歐洲人的飲食方式。在瓷器大規模抵達之前，歐洲普通階層使用的大多是石製、木製器皿和粗陶器。全套瓷質餐具的出現，為每個人的進餐空間劃定了範圍，促使同桌互動遵守自制。餐桌禮儀的重點從如何共享公碗轉向如何正確使用屬於個人的整套杯盤刀叉。歐洲人從中國學到了成套使用餐具的能力，西方人在餐桌上的教養由此建立。隨着茶具一同到來的中國茶，成為歐洲最潮的飲食風尚，兩者相輔相成，成功植入歐洲人的飲食習慣之中。此外，紋飾精美、工藝精湛的中國瓷器對歐洲人的室內裝飾和審美情趣也產生了重要影響。在十七世紀荷蘭的靜物畫中，中國青花瓷器大量出現，與進口地毯、銀器和水晶並置，成為財富與品位的視覺象徵。

克拉克瓷的傳播並未止步於歐洲。經澳門和月港輻射全球的貿易網絡將其運往日本、東南亞、印度、中東、東非乃至美洲。美國加州北部米沃克印第安人遺址中出土了不少克拉克瓷殘片，當地原住民將其改製為圓形飾品及刮削器。

更為深遠的影響，在於澳門催生的全球摹仿鏈。由於歐洲長期未能掌握高溫燒製硬質瓷的核心技術，荷蘭代爾夫特地區的陶工利用低溫錫釉陶技術，全力臨摹克拉克瓷的分區開光構圖與青花山水圖案。與此同時，明末清初景德鎮出口減少之際，日本有田窰瓷工也在景德鎮與漳州窰瓷器的啟發下，全面臨摹克拉克瓷布局，創造出「芙蓉手」瓷器反向出口歐洲。

考古實物為這一全球摹仿鏈提供了堅實證據。澳門聖保祿學院遺址大坑遺跡出土了大量克拉克瓷殘片，大多產自江西景德鎮民窰。從景德鎮母本到漳州響應，從日本效仿到荷蘭摹製—— 一條由澳門接駁的全球藝術對話鏈條由此完整呈現。澳門在這個故事中的角色，超越了「中轉港」的物理功能。它是「圖像翻譯」的場所 —— 歐洲的審美需求經由澳門被「轉譯」為景德鎮的生產指令。當景德鎮克拉克瓷盤、荷蘭代爾夫特陶盤、日本有田瓷盤並排陳列在博物館展櫃中時，它們共同講述了一個關於澳門的故事 —— 一座小城如何讓一座內陸山谷的窰火，照亮了整個世界的造物美學與日常生活。

▲七月二十二日，江西景德鎮，鎮區瓷業生產中心的觀音閣窰址展示館內展出的出土文物——明景德鎮克拉克盤。 中新社

「窮」的破局

如是我見

張君燕

近兩年，身邊常有朋友說到「窮」，態度半玩笑半認真，或調侃或自嘲。數次一笑而過之後，我對這個字產生了興趣，仔細端詳，發現「窮」字裏藏着一幅人生圖景。

提起「窮」，很多人的第一反應是物質匱乏，所謂「窮光蛋」是也。翻閱字典，「窮」的本意，多是匱乏、窘迫、處境艱難，是人生被桎梏、被局限的狀態。

繁體的「窮」，呈現出一個具象的畫面：一方狹小逼仄的洞穴裏，一個人躬身俯首、彎腰屈膝，被困住身形，伸不開手腳。簡化後的「穷」字，意蘊更是直白：穴下有力。人困於洞穴之中，空有一身力氣卻無從施展。

所以從字形上來說，窮的本質，不止是金錢的貧瘠，還有身心被困住的無力感。若是留心觀察，就會發現「窮」其實體現出了一種共性。當然，家境拮据本無對錯，但長久匱乏的物質條件，往往會困住一個人乃至一個家庭的眼界。缺少接觸新鮮事物的渠道，沒有可供學習提升的資源，所見只有日常瑣事，久而久之，想法容易變得固化狹隘。

見過不少過早輟學務工的少年，進廠做重複的流水線工作，無人托底，也無人引導，空閒時間全用來刷短視頻消磨，沒有想過學習一門手藝，也不敢嘗試新的謀生方向。可能夜深人靜的時候，他們也想過改變現狀，但苦於找不到可行路徑，只能困在當下的窘迫之中。此時，若有人拉一把，替他們打開視野與思想的局限，找到發力的出口，也許便能幫助他們破局脫身。

其實，漢字文化博大精深，一字之中，就藏着破局之道。「窮」字不止一種釋義，它還有極致、窮盡所有的深意。同一個「窮」，一邊是困頓，一邊是探索，正所謂得救之道就在其中。漢字的精妙，讓人嘆服！

身處「洞穴」、無力施展之時，便是人生之「窮」境。既然不能縱橫四方，何不試着轉換方向？專注自身，向內而求，專注於一事、深耕於一域。萬事受限，恰恰是最適合深耕自己的時刻——以「窮」的極致姿態，窮究一事的本質，窮盡所有的心力，窮追心中的熱愛。

人生沒有絕對的窮境。身體被困住，是境遇之窮；心神不被困，是成長之始。讀懂「窮」字，或許便讀懂了人生。

司徒美堂與羅斯福

人與事

海龍

司徒美堂是旅美僑領、洪門元老，也是愛國華僑。他出身廣東開平貧苦農民家庭，六歲喪父，十四歲去美國打工。他從唐人街廚師做起，後加入洪門致公堂，曾因打死欺侮華人的白人流氓入獄，其後又入伍美國海軍做廚師。就是這樣一個人，怎能跟美國總統羅斯福扯上關係呢？您別說，他倆還真有關係，而且司徒美堂還僱傭過羅斯福。細節容我下面道來。

美國第三十二任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出身名門世家，他的堂叔老羅斯福曾任美國總統。他外祖父沃倫．德拉諾（Warren Delano II）曾於一八三三年遠赴中國經商，在貿易中發了大財。這些財富支撐了羅斯福的母親薩拉．德拉諾．羅斯福及其八個兄弟姐妹的奢華生活。他們全家曾居住在俯瞰香港維多利亞港的一座豪華別墅裏，家中僱用了大批中國僕人。後來，他的母親經常向獨生子羅斯福憶起童年難忘的香港歲月，這無形中灌輸了他一種憧憬和懷舊情懷，使他對從未親見的香港乃至中國心嚮往之。這種情懷激發了他對華人和中國的某種情愫，下意識地幾乎影響了他一生。

當然，幼年不經意間的烙印雖顯示羅斯福家有中國淵源，但這種淵源能否影響他的意識形態或行動則應取決於更深層的因素：一、童年獲取的中國印象是否讓他對中國產生感情。二、他本人是否認可和讚賞這種文明。三、如果讚賞，這種理念是否會有行動。

通過閱讀羅斯福傳記和親去羅斯福故居莊園做調研和考察，可以得出結論他童年的中國情結對他的成長和行動是有積極影響的。

羅斯福素有大志，他的家庭也從小就悉心培養他成為棟樑之材。送他上貴族學校培養紳士精神、讀哈佛大學並關心政治，後效法當美國總統的堂叔從政，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畢業後當律師等等，足證他在一步一個腳印邁向成功的殿堂。

羅斯福跟司徒美堂相識就在他初出茅廬當律師階段。他們之間的友誼始於僱傭關係，後昇華為具長期友誼的朋友。他們二人間跨越種族和階層的交往不僅成就了一段傳奇，也為改善早期美國華人生存境遇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史料載他們之間有過十年共事經歷。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司徒美堂在美國創立了旨在保護華僑權益的「安良堂」。為了應對複雜的社會糾紛與種族歧視，司徒美堂聘請羅斯福擔任法律顧問。年輕的羅斯福為人公道，盡心盡力。在十年交往中他們建立了密切的業務關係並結下了深厚的私交。因為是華人社團的僱傭律師，羅斯福任職總統前，安良堂或華人社區遭遇欺壓和法律糾紛，羅斯福就會仗義執言履行職責為華人伸張正義。羅斯福當選美國總統後，他正式辭去了安良堂的法律顧問，但他與司徒美堂的友情卻仍然保持着。

此後十幾年間，相關社團華人面臨不公待遇，司徒美堂致信羅斯福時，他仍然會迅速親筆回覆並協調解決。據考這段私人友誼在二戰期間也發揮過重要的政治作用。在司徒美堂、賽珍珠和美國熱愛和平熱愛中國人士以及中國政府等力量的積極游說和發動下，羅斯福政府在一九四三年支持並促成美國國會廢除實行了六十餘年的《排華法案》，提升了美國華人的國際地位和權益。

司徒美堂和羅斯福這段充滿傳奇色彩的跨界友誼，不僅體現了司徒美堂在美國奮鬥利用法律維護僑胞權利的精神，也充分展示了早期華人艱難奮爭在美國政界發揮影響力、巧妙為海外華僑爭取合法權益的努力。

除了司徒美堂影響外，童年烙印無疑會影響羅斯福的思維。傳記上說，他很驕傲於自己家祖上跟中國的淵源。他曾對財政部長亨利．摩根索說：「我在中國事務上有着一個多世紀的家族背景。」他甚至默認自己有中國通背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他主政時支持中國抗戰的政策當然是從美國國策考慮，但他跟中國的情感因素也不能說在其中毫無意義。我在他家中看到了很多中國元素包括中國傢具、瓷器、藝術品等。他夫人對中國抗戰和對「國際工合」的有力支持，甚至在他們家開辦了工合作坊等，都可以看出這種深層的中國情感因素的作用。

絕美卻「任性」的索爾維公館

藝象尼德蘭

王加

去年七月專程到布魯塞爾打卡比利時新藝術運動建築泰斗維克多．霍塔（Victor Horta）的世界遺產建築群，收穫的多是失望：塔塞爾公館完全不對外；任性的索爾維公館（Hotel Solvay）每周僅開放半天也完美錯過；唯一邁進建築的霍塔故居博物館甚至不允許拍照，每個人連手機都要鎖起來，為了確保圖像版權和粉絲到場「朝聖」也是拚了。一年後再訪布魯塞爾，臨行前想着死馬當活馬醫，查一下心心念的索爾維公館，結果無心插柳柳成蔭：落地當天恰好開放，竟還有餘票！人生，往往在破執之後方得驚喜。

抵達索爾維公館，驗票後工作人員告知需套上鞋套，有四十分鐘自由參觀時間且允許拍照，可把我高興壞了。和建築師的故居博物館有所不同，屋內除了霍塔設計的燈飾、傢具和主人索爾維家族的照片之外，並未留下太多生活氣息，也沒有珍貴藏品可供欣賞。對於習慣了置身事外欣賞畫作的我而言，索爾維公館最大的驚喜在於我們可以走進建築設計師的作品，去切身感受他所有的立體巧思和美學理想。

相較活躍於同時代的西班牙建築鬼才安東尼．高迪那天馬行空的創意，霍塔的建築作品在外立面上看起來克制很多，但室內卻別有洞天。在先後參觀了霍塔故居和索爾維公館之後，能看出二者是有顯著差別的。作為他的生前居所，霍塔將畢生的創意與想法一股腦兒都堆進了家中。其故居風格是兼具私人審美和居住實用性的結合。相比之下，大亨索爾維不計成本請霍塔打造的宅邸是真正意義上的「奢華秀場」。他偏愛植物藤蔓的蜿蜒曲折，大到其鑄鐵建築結構、樓梯扶手和吊燈、小到傢具轉角和門把手，其大量使用圓弧形和曲線的設計充滿了我國十天干「乙木」的藤蘿繫甲特性。柔韌線條的點綴既軟化了鑄鐵結構的生硬冰冷，也完美契合新藝術運動的設計精髓。而花卉燈飾、枝葉門把、管風琴狀的壁爐，甚至門口用石料雕刻出的花樣數字門牌，尼德蘭地區藝術傳統中的細緻入微無疑被霍塔完美繼承。

索爾維故居令我驚艷的點，在於霍塔對室內採光的設計。無論是「初代祖師爺」揚．凡．艾克，還是克拉拉．皮特斯、威廉．赫達等十七世紀靜物畫大師，尼德蘭巨匠們都非常善於表現光線的反射與折射。這種觀察與表現自然細節的傳統，傳承到霍塔就從單純的平面化記錄演變成了複雜的三維空間採光實踐。由於尼德蘭地區的很多傳統建築都是聯排的，採光對畫家和設計師都是巨大挑戰。親臨博世、倫勃朗等大師的故居，其畫室都要選擇光線最佳的空間。但霍塔的設計巧妙在於，他首先用鑄鐵結構打造了三層的天然中央「光井」，再將屋頂用彩色玻璃覆蓋形成自然採光，隨着屋內每層分別鑲嵌彩色玻璃或半透明玻璃隔窗製造光線的漫射過濾，柔和且着色的自然光便可貫穿整棟建築。而全套光源設計體系的點睛之筆，非榮譽樓梯庭頂端的貝殼狀彩色玻璃天窗莫屬。

◀布魯塞爾的索爾維公館一隅。 作者供圖

尼德蘭地區自文藝復興時期便以彩繪玻璃工藝聞名，而這項傳統手藝被霍塔注入了充滿自然主義的新藝術運動形式。整面彩繪玻璃天窗既像孔雀開屏的盛放羽翼，又如輕薄的蜻蜓翅膀般紋理。垂直灑下的天光經彩色玻璃折射形成如彩虹般的七彩泛光，點亮了整棟建築的挑高空間和兩側客廳。索爾維公館，無疑是霍塔「結構——採光——裝飾合一」設計理念的巔峰之作。

站在索爾維公館的階梯上，抬頭仰望那色彩斑斕的絕美彩繪玻璃天窗，不由得想起了歌德那句名言「建築藝術所營造的氛圍，正接近音樂的效果」。連榮耀樓梯的扶手都帶有音符或圓號的即視感。身臨其境，彷彿任何美妙的旋律都與之完美適配。既如此，或許每周半天的任性營業時間對建築本身算是一種「物以稀為貴」的硬性保護手段吧。